

# 斗转参横春神州,可念长夜写书人

## ——《梁启超评传·后叙》

蒋广学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关键词] 梁启超;《梁启超评传》学术与思想

[摘要] 撰写《梁启超评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深入学习与感悟梁启超学术与思想的过程。

梁启超以救亡和“新民”为己任,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与思想成就曾受到了不应有的冷漠甚至否定。回顾百年来我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更会觉得梁启超学术与思想具有久远的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5)05-0133-04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1960—1965),梁启超是作为反面教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是位保皇党首领,同时还因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攻击共产党而声名狼藉。改革开放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正面肯定,康有为、梁启超的名誉也有所恢复,但我对梁启超仍停留在“抽象的”认识上;真正地在学问上与他打交道,是 1990 年进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后的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要求我对“评传”的书稿在审稿人、分管副主编审稿的基础上进行“拾遗补阙”的工作,而当我读到杨俊光先生的《惠施公孙龙评传》和邢兆良先生的《墨子评传》以及其他书稿时,才逐步地认识到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对先秦名学、墨子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学术都有很精深的研究。那时,我买来 12 大本的《饮冰室合集》,核对杨著、邢书和其他“评传”的引文,无意间却发现了我与梁先生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上竟然大致相合。他在 1921 年初发表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宣称:“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sup>[1][P3]</sup>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不顾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不仅是无法巩固的,同时也不可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好处。1980 年我与孙辉共同撰写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不也是宣传了这一观点吗!这样,我便对梁启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甚至认为:在我这个普通人与他这位大人物之间,不仅心灵相通,同时亦“同病相怜”:他在 1926 年 54 岁时因肾病而切除了右肾,而我在 1991 年 3 月 51 岁时也将右肾切除!匡老同意我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莫非是在冥冥之中,由命运安排我来承继他未竟的事业,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这样,在 1994 年我 54 岁时就正式接下了撰写《梁启超评传》的任务。十多年来,我总是结合着“评传”的阅稿、访问各地作者以及教学工作,从事梁启超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开始是写单篇论文,继而撰写《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现在终于完成了《梁启超评传》的撰写和校对的任务,将我对梁启超以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打了一个“结”。

或问:小子之言与先哲时贤有无不同者?答曰:无故意标新立异者,却有因时、因地、因作者之性而与他人有异者也。我生在赤贫之家,在共产党解救以及长期教育和培养之下,才成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教师,因而,自 1980 年与孙辉合写《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

[收稿日期] 2005-06-29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42—),江苏沛县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论问题》自觉地进入“著作者之林”以来,我便把“为百姓争平等、为国家求富强、为社会主义、为马列谱华章”作为治学的出发点,并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己心头的困惑作为突破口,努力向未知的领域进发。有以考实辨析原本、阐发研究对象的原义为学问者,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虽然十分可贵,但与我的性格不合;也有跟从风气而玩学问者,这种人云亦云、专门排泄思想和文化垃圾,只求眼前的口福而到头来空空如也的人,连自己都觉得难见江东父老,我怎能与之伍呢!自记事以来,儿时的苦难、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运动,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历历在目。由这些切身经历所培育起来的思想与情怀,在我研究梁启超的时候,怎能不与他相激、相荡、相因、相成,而形成时而激昂、时而婉约的思想之流呢!更何况,梁启超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笔锋常有惊雷滚动,与他相激,常常是夜不安寐、日不甘食。

如果仅仅从理性上来看梁启超,随时而更新的他,其思想变化实是1890年-1930年40年间中国思想史之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日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让他认同了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革命论者”发生冲突;又因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倒“孔家店”、声讨“玄学鬼”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竟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特别是佛家、儒家与道家的学术,来拯救被万能的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以便让人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精神境界。哦!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似乎不应该被全然否定。但是,当时光回到1905年孙中山举起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以及回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其后举起社

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压在“三座大山”最低层的劳苦大众,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生活,怎能不紧跟着孙中山以及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推倒旧世界、翻身求解放呢。这层含义,如果用理论家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打碎数千年来硕大无比的、盘根错节的、“超稳定结构”的、失去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及要赶走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变成自己掠夺对象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得民族解放,必须经过残酷的、长久的、反复的、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才能完成。前不久,我读到几位历史学家的文章,提醒人们不能对这一革命过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此,我十分赞成。我确实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死无葬身之地的我,其尸骨早被野狐嚼尽了,哪还会挂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人模人样地生活在世上呢!

不过,我要补充的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半个世纪同样是“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同样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1956年之后的中国仍然按照上半世纪历史的惯性,以激进的方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激进的方式打倒不同意见者,分别将他们称为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统统打翻在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当作“封资修”,而统统扔进垃圾堆,从而使怀疑主义、破坏主义、打倒一切的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无阻。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心大坏,这是我们每个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所无法忘记的;在这些运动中,我本人也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历过盲从、积极参加、动摇怀疑、逍遥疏远、消极抵制的复杂过程,因而,更是不会忘记的。而正当中华民族处在万分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自我革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拨乱反正”就是重新“反刍”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在相对的“回复”中开掘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转折啊。而这一转折过程,同时是长久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记得在邓小平同志刚刚提出这一口号时,有人查出它出自《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孔子在谈为何作《春秋》时说:“拨乱世、返诸正,莫近诸《春

秋》》<sup>[2] (P2355)</sup>。这个“辞源”，把一些胆小鬼吓得丧魂落魄：邓小平莫非真是走资派？而另外一些站在极“左”的立场上不能自拔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真的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视为“开倒车”的复辟运动，随着包产到户、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运动的全面展开，他们心灵深处的憎恶和恐惧与日俱增。这也是历史啊，我在理论界、学术界的老师们、同事们和青年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能对这 50 年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当我们把这一百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总体的回顾后，再来研究梁启超的上述思想过程，便可发现，当初被我们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梁启超及其思想学术成果，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如果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必须靠革命的暴力方能打碎的话，那么，无论是“反制”激进主义的历史惯性，以保育方式医治“革命”的后遗症，还是以稳健的步伐建造新的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我们都可以在他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本《后叙》无须重复全书的内容。我只强调一点：梁启超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守旧主义者，更不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他终生都以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教导人们向着民主、富强、文明和自由的方向前进。他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全民公德水平和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以此构建起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然而，这个民主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以法制为基础，以每位社会成员充分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生气勃勃的政治制度。他反对超阶段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和奖励生产，并且鼓励以“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建立起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个社会主义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物质财富相对丰富<sup>①</sup>为基础，无贫富悬殊、“人人均安与和谐”的经济制度。他多次宣称：“吾不患西学之传入而患中学之将亡”，因而在其前期将先秦诸子学作为通向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坚实桥梁，后期则更提倡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物欲俘虏了的心灵；然而，他始终怀着开放的心态，将西方各种学说介绍给国人，希冀在中西学的相互交融中，建立和发展以“至性主义”即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多元主义。他不是一位宗教徒，特别反对奴化主义和各种迷信邪说，但他同时坚

信，在人们物质及社会生活之外，应该有一片只属于“人类自己”的伊甸园或涅槃圣地，因而，始终怀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且以现代进化论重新解释佛学、儒学、墨学和道家学说，努力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起一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人间乐园。当我们重新请出这位思想家的时候，万万不能离开他为之大声疾呼、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为之梦绕魂牵的伟大目标啊！梁启超博大精深的学问，无疑是让人仰慕不已的崇山峻岭，而我的书只是从这崇山峻岭中流出的一条河流而已。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他的信徒。说到底，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时，是吸收了那个时代世界文明最优秀成果的话，那么，它每前进一步，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激、相荡、相因、相成，从而开辟自己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我正是以此胸怀评论和吸纳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以敬献给我所热爱的广大读者。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谭嗣同评传》。谭嗣同是一位“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主张，中国惟“尽变西法”方能新生，而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力挽狂澜而救世，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殉道精神是这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家的典型写照。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我同样怀有极大的尊敬。由于原作者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百事缠身，无法完成撰写任务，于是他就将自己发表过的两三篇论谭文章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后来的作者作为参考。我请了青年朋友何卫东同志来承担撰写任务，黄文为他研究谭嗣同提供了预备知识，而一旦进入谭嗣同的研究后，他便在李喜所、徐义君、周振甫、张灏、王越等先生以及我本人观点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思路，独自完成了写作任务；书稿经过审稿人提出意见后又由我来修改定稿，现已难以分清哪些是黄先生的痕迹了。但无论如何，何卫东和我都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其实，我应该表示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深受马洪林、李喜所、董方奎、耿云志、张朋园、张灏、列文森、狭间直树等大家的影

<sup>①</sup>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不是好事，它只能刺激人们的享乐欲望，因而主张社会既不过于富庶，同时也不至于贫乏。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卷 50，第 182 页。

响;丁文江、赵丰田、李国俊、李兴华诸先生的梁氏年谱或著作谱系,同样给我极大的帮助。我对他们成果的引用,已随文一一列出,现公开致谢。也感谢弥补我佛学知识欠缺的洪修平教授、黄先炳博士和傅新毅博士,感谢弥补我经学知识缺欠的申屠炉明博士,感谢全书审稿人朱庆葆博士,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书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面貌与

读者见面。还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张玉芝先生、大学老师李华钰先生等前辈,他们的关怀和教导,是我成长的重要条件。最后,更感谢我的妻子、儿子、孙子,他们给予我的天伦之乐,是医治我日益衰老和疲惫身心的灵丹妙药。

著述不存名山心<sup>①</sup>,祈望来者有知音。斗转参横<sup>②</sup>春神州,可念长夜写书人。

###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6)[M].

[2]十三经注疏(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 O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ao——Epilogue

JIANG Guang-xue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Liang Qicao,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ao, academy and thinki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ao is the process of my systematic study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Liang Qicao's academy and thinking. Liang Qicao takes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Ximin" as his own task, but his academy and thinking which have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receives unjust indifference and negation. Retrospecting the tortuou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e further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 Qicao's academy and thinking.

[责任编辑:刘一兵]

① 最近读到一本论梁启超的书,以梁氏年轻时“著论求为百世师”的诗句为题,来论述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这是对梁启超写书宗旨的误解。他在《墨子学案》的自叙中说:“吾尝以为著书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人人各贡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唤起社会研究之兴味,其疏漏误谬,则自必有人焉补苴而匡正之。斯学术之所以见其进未见其止也。”(《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9第1页)

② “斗转参(ān)横”,即斗转星移。典出《宋史·乐志·鼓吹》下:“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